

SHANXI DAXUE
LISHI WENHUA XUEYUAN
KUESHU LUNWEN JI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

LISHIJUANYUANXIA【历史卷下】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SHANXI DAXUE
LISHI WENHUA XUEYUAN
JISHU LUNWEN JI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

LISHI WENHUA XUEYUAN
【历史卷下】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 /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78-3049-2

I. 山… II. 山…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7268号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论文集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www.bywy.com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47.75 字数: 1200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册

※

ISBN 978-7-5378-3049-2

定价: 110.00元(全三册)

目

录

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1866年—1868年）	江 地 503
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及其影响	郭卫民 531
关于洋务运动的几个基本概念	郭吾真 545
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	任茂棠 557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原因探析	冀满红 573
略论阎锡山与晋系军阀的崛起	刘书礼 张 生 583
山西“一二·一八”血案	陈文秀 596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诸问题	乔志强 陈亚平 608
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	
——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	行 龙 636
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	王先明 653
社会史视野中的风俗	
——兼论传统风俗与传统社会	王守恩 675
共同体何在？	
——基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通利渠的调查与研究 ...	张俊峰 693
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乔新华 739

传说、信仰与洪洞乡村社会

——兼及大槐树移民的文化认同 郝 平 758

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

——张初元的型塑化过程与“张初元模式”的建构机理

..... 岳谦厚 张基辉 773

山西大学堂对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贡献 王季金 797

澳门社会福利管窥 李淑蘋 808

论前十七世纪前埃及和两河流域社会的

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陈文明 820

试论古代埃及的阿吞崇拜 李 模 856

奥尔弗斯教及其主要影响 杨巨平 869

中国和北加里曼丹的古代文化经济交流 田树茂 887

“土耳其人阻断商路”说与西方的近东殖民 王三义 895

关于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金嗣焜 912

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 阎宗临 932

《杰伊条约》试析 王荣声 949

论豪萨圣战的性质 李忠人 961

试论英布战争中的几个问题 张谦让 978

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 程人乾 993

近代日本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干预

——以海运、造船业为例 杜小军 赵金贵 1013

治标不治本

——评西方国家的调整与改革 叶昌纲 1020

美德原子弹研制角逐成败原因评析 王文庆 1038

试论苏联对朝鲜停战谈判的影响 宋晓芹 1047

德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外交战略探析 吉珊珊 1060

试析克罗地亚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 张世满 1069

论东捻军的抗清斗争

(1866年—1868年)

江 地

一、末期捻军战争的时代背景及捻军分军原因的分析

1866年(同治五年)的秋天,捻军在歼灭了僧格林沁的内蒙古骑兵、击败了曾国藩指挥的湘、淮军之后,在河南许州^[1]将部队分成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地区坚持抗清斗争,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2],是为西捻军。分军之后由于清军的阻击,地区的遥远,两支捻军就没有能够重新会合,所以,分军之后的捻军三年抗清斗争,可以说是捻军战争的末期。

捻军为什么要分军?这是和1866年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分不开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期间,清王朝已经和“洋人”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的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继续保持下来,而且更加密切。比如,在捻军分军前两年,中国沿海沿江一带,有十四个商埠,建立了由洋员把持的海关税务司。隔了一年,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设其官署于北京,并参预清廷中央的内政和外交。这时,美、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他们的使馆设

在北京,还有许多国家也纷纷和清王朝订立了条约。清王朝用条约的形式把国家主权拍卖给外国侵略者,所换得的是外国侵略者以军火和参谋人员帮助清廷击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起义军。比如,1862年在上海的“英法教练勇”中的英国“会字营”(由英国戈登、哲贝教练过),其中一个营曾参加淮系潘鼎新部进攻捻军^[3],英国军官柯纳曾在山东参加攻捻战争^[4],清通商大臣崇厚曾经派出有洋人、洋枪的“洋枪队”把守烟台和黄河北岸,以防捻军北渡黄河。在东南,英、法驻厦门领事曾经严密封锁海口,断绝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从海外输入军火,以帮助左宗棠的清军击败他们。在西南,法国商人赌布益以大量军火由越南输入云南,帮助清廷扑灭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抗击清军。在西北,英、俄两国从新疆方面给左宗棠以协助,使他击败陕、甘的回民军。特别是淮系军阀李鸿章,他之所以能够享“灭捻”之功,主要就是依靠从上海方面而来的源源不断的外国军火的接济。

总之,清王朝拍卖国家主权给外国侵略者,外国侵略者以军火和人力支持清王朝,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这便是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之一。

国内形势之另一特点,便是清王朝和汉族军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三大集团的合作,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清王朝在攻打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既不能不依靠汉族军阀的湘、淮军,它也就不能不给曾国藩、李鸿章等汉奸刽子手以军政实权。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曾国荃任湖北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湘、淮军阀分别盘踞着长江沿岸各省。江苏和上海是淮系军阀的地盘,在攻捻战争中,李鸿章曾经连奏几本,说明淮军产于皖、苏地区,到豫、鲁两省去打仗就没有把握,其实就是不愿意叫淮军离开地盘,等他终于不得不担任“攻捻”主将之时,便连忙以张树声代任江苏巡抚,张为淮系悍将之一,算是自己的人。曾国藩攻捻无功下台时,李鸿章

连忙派人去要钦差大臣关防,曾国藩气愤辞职,并拒绝为准军筹饷,曾经使湘、淮之间的矛盾一度紧张。湘、淮矛盾的实质是两系争夺政权和地盘,清廷则利用他们的矛盾,使两系军阀“均为我用”。从湘系分支出来而又反对湘系的楚系集团左宗棠,他的地盘在浙江、福建,办马尾船政局,练南洋水师,继续保持和法国人从战时以来的合作,都是为了巩固浙江地盘采取的措施。三大军阀的地盘和政权虽然常有变动,但基本上是控制着太平天国的旧地区。在中国人民的血泊里,中国近代军阀的始祖产生了。

随着攻捻战争的进行,汉族军阀的势力也由南向北转移。左宗棠之得以任陕甘总督而握得西北军政大权,李鸿章之得以此后担任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都是和捻军战争分不开的。湘系集团之未能壮大反而日益衰落,也是和它在攻捻战争中的败北分不开的。可以说,湘系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产生和壮大,而在捻军战争时期衰落的;而淮系是在太平天国时期产生,在捻军战争时期壮大的。淮系的发展和湘系的衰落以及楚系的进军西北,攻捻战争是其决定的因素之一。

那一系军阀屠杀人民起义军越多越凶,那一系军阀便在起义地区建立它血腥的统治。没有人民起义的失败便没有军阀的壮大;没有人民起义的威胁,清王朝也决不能向汉族地主阶级让出政权和地盘。清政府为了利用汉奸刽子手来屠杀中国人民,不只给湘、淮军阀以军政大权,并且还给他们以大量的财富。湘军攻破南京时,获得大量金银,清廷不予深究,正是对湘系掠夺行为的默认。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努力裁撤湘军,以表示对清王朝忠诚,他所换得的是富贵尊荣。以湘乡一县举例(该县是曾的家乡),二品以上官吏竟达一千家,不足二品的各种爪牙,江南何止数万。用郭嵩焘的话来说,这叫做“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5]。曾经在家书上说是要“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的湘系悍将彭玉麟,却以“厘金一项,

盈余未结”，而“贪恋于仕禄”^[6]，可见太子少保的官衔，还没有厘金的诱惑力来得更大！经过洋务运动又经过攻捻战争，李鸿章的财富是从经营军事企业和战争中的掠夺两方面搜刮而来的，因此，他竟达到“富甲天下”的程度，梁启超在他写的《李鸿章》一书中说：“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营业云。”中国近代军阀是官僚、地主、商人、买办的混合物，这也是在它的雏儿时期就具备了的特点。

汉族军阀在获得地盘、政权和财富之后，为了攫夺更大的地盘和更多的财富，也就益加竭力媚满媚外，也就更加为其中外主子而拚命讨伐、屠杀革命的人民。僧格林沁败死之后，清廷失掉了嫡系精兵，也搬掉了满、汉封建统治者中间一块妨碍合作的绊脚石，于是，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湘系出马攻捻，接着是淮系和楚系分别担起攻打东捻军和西捻军的重任。

在捻军战争的末期，清王朝、外国侵略者和汉族军阀三大反动势力进一步结合，更明确地表现出它们是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这种结合，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开始，在镇压捻军的战争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捻军革命史，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7]。

这时，全国抗清的武装力量除了捻军以外，还有：贵州苗民军、云南回民军、西北回民军。这些抗清军都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起义，而彼此间发展却很不平衡，有的正在高潮（如回民军），有的却已走向劣势（如苗民军）。他们人数多，地区广，声势大，表现了中国农民战争的坚韧性和普遍性，是其优点。但是，他们起义地区极为分散，民族成见很深，彼此都是孤军作战，因而难以抗击具有全国统

一政权的清王朝。西捻军虽曾专意到西北去联络回民军,但民族的隔阂、清廷的挑拨、回民军抗清运动的复杂性等条件,都妨碍了彼此间的联合,因而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愿望。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说:“农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极难得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是永远不能企图得到一个胜利的独立的运动的;他们需要城市里更集中、更有知识、更易动员起来的人民的领导和推动。”正说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推动,分散的农民战争是不可能得到胜利的。

从全国当时的革命形势来看,自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反革命凶焰大张,革命的低潮时期已经到来。汉族军阀建立了江南的统治权,清王朝度过了极端危险的1860年^[8]。所谓“同治中兴”的叫嚣,说明了反动统治得到暂时的稳定。从1864年以后,全国各地的零星起义大为减少。当太平天国初期,那时各地起义真是像雨后春笋,接连不断。北方农民起义最多的鲁、豫、皖、鄂四省,这时有的已经失败,有的又自动转入秘密结社以继续其秘密活动。这时,捻军所到之处,人民起义大为减少,形成单纯军事行动,抗清斗争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清军云集捻军战场,为了冲破敌人的围攻,末期的捻军采取了盲目的流寇主义军事行动。战略计划的任意更改,冒险进入山东海滨的错误等,使反革命方面得以利用捻军的弱点而举行“扼地兜剿”。加以这种流寇主义和农民阶级的保守性、地方观念是矛盾着的,就更造成了捻军脱离千万农民群众的危险。因为捻军战场既在“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的广大农村中,而“乡村居民中……农民群众则从来不曾超出最临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9]。所以,农民不愿意离乡背井、舍弃小块土地,去跟着捻军的流寇主义行动而奔跑,末期捻军史上农民参加捻军的记载减少,正是这个原因。

总之,1866年前后国内政治形势的特征是:中外反革命的结合,清王朝和汉族军阀的结合,捻军缺乏城市中的阶级同盟军,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各地起义军的分散和隔绝,捻军流寇主义与农民地方观念的矛盾,各地小股起义军的日益减少,等等。这一切主观、客观条件的综合,就形成了捻军斗争的极大困难。这种困难,在捻军中间的反映,便是《赖文光自述》中“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的说法。为了摆脱这种劣势,捻军遂分军为二,以便互相结为犄角,并使西捻军去联络回民军,“以期复国于指日”。但是,分军的后果正与捻军领袖的主观愿望相违背,使捻军斗争的力量更加分散而削弱,东捻军与西捻军反而被切断联系,因之,就不得不被迫在两个战场上分别抗击清军。而西北回民军由于宗教的隔阂,地方的限制,也没有能够和西捻军团结一致,共抗强敌,因而当东捻军覆灭在江苏的前夜,西捻军虽然星夜东下,深入京畿,以谋救援,但败局已成,反而连西捻军也覆没在运河以东的徒骇河边了。捻军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因为反动地主阶级背后有外国资产阶级支持,而革命农民前面却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其主观原因是捻军的流寇主义和农民地方观念的矛盾,而错误的战略行动造成清廷围攻的有利条件。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中,旧式的农民运动不可能获得胜利,在这里又得到一次证明。

二、东捻军抗清斗争的胜利和发展

从1866年十月二十三日(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东捻军和西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军开始,到1868年一月五日(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东捻军在江苏扬州覆灭结束,这中间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是东捻军抗清斗争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以1867年六月十三日(同治六年五月十二日)东捻军渡过运河以东为分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前期的战场在湖北,战争的结果是东捻军胜利而

清军败北；其后期的战场在运河以东的山东和江苏，战争的结果是清军胜利而东捻军失败。以下，我们先说其胜利和发展阶段。

分军之后，东捻军即由许州向东北，越黄河故道而进入鲁西南。这里是东捻军经常到达的地区，僧格林沁的骑兵就是在这里覆灭的。这次，东捻军的目的是由此抢渡运河以进入山东，在运河东岸解决军粮和扩大部队。因为“（山）东（江）苏八府二州之间，袤延千五百里”，不仅“处处富庶”，而且起义地方较多^[10]。这时，黄河北岸有“盐枭”（私盐贩）起义，肥城黄崖山有教民起义，郛城梁山有“水套”人民起义，徐州微山湖里有“湖团”起义，雄厚的群众力量，正是捻军得以存在而且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但是，曾国藩在运河东岸构筑的长墙工事，阻挡了“全无火器、不善攻坚”的东捻军，大量的清军防守在运河防线上，使东捻军在北达郛城，南抵徐州的运河西岸千里战线上“扑渡”了两个半月，还是没有过去。十一月底，东捻军突然折而向西，以疾行军经河南而达鄂东北地区。战场由山东转移到湖北，大量的清军被扔在山东，清军的战略计划随着东、西两支捻军的分别进入鄂、陕而全部破产，曾国藩下台，李鸿章担任攻捻主将。

东捻军为什么要进入湖北？它的战略企图何在？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因为捻军的战场虽扩大到鲁、豫、陕、鄂、皖、苏等省，但它的基本作战地区却只有三处：皖北雉河集、山东水套、鄂东麻城。皖北是捻军家乡，水套有人民向导，又有良好地形，所以捻军进入这两个地区，这是容易理解的。捻军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鄂东，过去是因为谋解太平天国的围困，而现在却是有一个巨大的正确的战略计划准备实现的。据薛福成在《庸庵内外编》中说：

众逾十万；盘旋（湖北）德安、安陆之间，谋以一枝越襄河（汉水）蹯蜀疆，一枝屯湖北为声援，一枝闯武关联西捻张总愚。”^[11]

同样的记载，见之于曾在鲍超“霆军”里当爪牙多年的陈昌所写《霆军纪略》里：

据擒获贼酋并任怀邦、赖文光、李允之妻供称，此股捻逆纠合精悍原多，骑贼居半，合计不下十万之众，议欲以一股偷渡襄河，循荆州、宜昌上犯川境，以一股屯住湖北为声援，以一股入陕与张总愚股合并。倘各路皆不得手，又不能窜回（安徽）颖、亳一带，解散归家，则共趋秦中，勾连回匪，以成负隅之势。^[12]

在张仲忻等编纂的《湖北通志》中，更引用了东捻军领袖遵王赖文光原话如下：

（尹隆河战役中，东捻军击败淮系刘铭传军时）赖汶洸顾诸伪众大言曰：“今日斩刘（铭传）捉鲍（超），长驱西上，一入四川，据巴蜀之利，一上荆紫关，合张总愚攻陕西，洪大王事不足为也！”伪众皆大喜。^[13]

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沦陷的前夜，李秀成向洪秀全有过“让城别走”，向长江上游谋发展的建议；石达开几次率大军西征，也是想在四川别建新国；《赖文光自述》中也有“以期复国于指日”的愿望。由此可见，太平军、捻军的领袖们，许多人都曾经有过在川、陕建立新国的理想。我们把上述史料和这些愿望以及东捻军入湖北后的军事行动等方面联系起来看，便可以断定东捻军这次进入湖北的战略计划是准备以大军进入川、陕，和远在西北的西捻军、回民军联合起来，以四川为中心，以陕、鄂、黔、滇等省为外围，逐渐开创一大片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像太平天国一样的国家。这样一来，既可以和西北回民军联系起来，也可以和西南苗民军及云南回民军联系起来。这个计划，不仅符合当时千百万起义人民的愿望，也符合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因为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平衡，江南一带革命走向低潮，反革命凶焰大张，而内陆地区的大西北、大西南革命却才走向高潮，革命起义军声势大振，陕、甘、黔、滇等省都有声势浩大的

革命力量,而反革命却表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

但是,这一战略计划要想实现,还必须经过一场巨大的斗争。当东捻军刚刚进入湖北之际,清廷攻捻主将李鸿章也就确定了清军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照李鸿章的说法是根据明臣孙传庭进攻李自成的反动论调,即所谓“扼地兜剿”的战略,就是将东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人,然后会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4]。现在东捻军既以安陆府(钟祥)之臼口镇为活动基点,这里前有长江、汉水阻挡,后有大洪山脉之险,捻军骑兵不能在“山径交错,河湖交汉”的地理条件下发挥其长处,李鸿章便确定了“臼口之围”,向清王朝报告这是他的围攻计划第一步。

这年年底,清军遂纷纷向湖北地区集中,并形成一大包围圈,向东捻军的基点——安陆府臼口镇地区逐渐合拢压缩。清军分布大体上是:湘系鲍超所部霆军战斗力最强,摆在汉水东岸及襄阳、樊城一带,以防东捻军进入川、陕;淮系刘铭传所部是淮军最称能战之军,与豫军张曜等部摆在鄂、豫交界,以防东捻军进入河南;安徽巡抚英翰率皖军驻扎鄂、皖交界,以防东捻军进入皖北家乡;湖北巡抚曾国荃驻扎武胜关,把他刚刚练成的六千名新湘勇作为“游击之师”,去试一试东捻军前线的刀锋。这次计划,由李鸿章直接指挥,由左宗棠协助指挥,由曾国藩在南京供给军饷和军火,三个汉族军阀及全部清军一齐出马,军事情况的严重,是可想而知的。

在东捻军方面,也正在全盛时期,它不仅人数有十余万之众,而且自从消灭僧格林沁骑兵以后,便获得大批战马,骑兵部队竟超过半数以上。将曾国藩击败之后,获得不少洋枪,新式武器也占有相当数量。东捻军一入湖北,连湖南湘乡的哥老会也闻风起义,东捻军在湖北获得了地方起义军的支持和向导便可想而知了。特别是东捻军成员都是久经战斗的太平军、捻军老战士,其战斗力是相当强的。捻军将领除遵王赖文光以“善谋”、鲁王任化邦以“善战”而著称之

外,还有原在浙东的太平军将领首王范汝增及魏王李蕴泰、怀王邱朝贵、宗王任三庆、荆王牛宏升之子牛遂(即牛喜)、列王徐昌先、奏王赖世就等人。这些将领都团结在赖文光、任化邦领导之下,达到了《赖文光自述》中所写的“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程度。以团结的一致性来说,农民战争性质的东捻军是达到了可惊的地步的,太平军、捻军两支队伍联合抗清,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团结的迹象,这一点,清官书上也无法否认,比较起太平天国的后期战争来,是远远超过了的。这和赖文光的领导分不开,这和当时恶劣的客观环境分不开,这和捻军后期战争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战斗力,也是不能分开的。

1867年一月(同治五年十二月),清军的围攻与东捻军的反攻战争开始了。十一日(初六日),东捻军在臼口镇附近罗家集,将曾国荃的新湘勇四营全部消灭,活捉提督郭松林,郭本人身中七枪,胫骨被打断,不能行走,捻军弃之道旁,郭始得逃出活命。这一役,东捻军首先选定清军战斗力量薄弱的一环来打击,使成立刚刚四月,仓促拉上前线的曾国荃的武力覆灭了。曾国荃受到“京师权贵”的严重攻讦,“灰心懒漫,剧萌退志”^[15],湘系集团益加衰落。

半月以后,(二十六日)东捻军在德安府的杨家河,再一次击败淮军,杀淮系悍将之一总兵张树珊,并歼灭其所率领的全军。淮系集团受到沉重打击,李鸿章失掉一个凶恶的反动助手。

两次胜仗之后,东捻军虽然还没有击破清军的围困,但确已声势大张,令清军闻风丧胆了。从薛福成的记载中,可以想见当时东捻军的英雄气概:

是时,贼骑数万,(其实是十余万!)云翔风驰,劲疾剽悍,常以前队挑战,别选健骑绕出官军后路以格之。官军畏其锋,辄凭村堡自固,罔敢与遇,遇之鲜不挫者。贼势张甚,连陷应城、云梦、天门。旋弃城去,屯踞白口、尹隆河以窥安陆。^[16]

东捻军是只取乡村,不攻城市的,城市的取得只是在大胜之后的偶然行动。东捻军在两胜之后,产生了轻敌思想,清军在两败之后,知东捻军并非轻易可以击败,遂命令其两支精锐:鲍超军由西向东,刘铭传军由北而南一齐进攻,将东捻军压缩在尹隆河地区包围歼灭。于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尹隆河战役开始了。

1867年的二月十九日(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东捻军在运用其流动战术,与淮系刘铭传军相周旋,而将其拖垮之后,将大军埋伏在尹隆河附近,以包抄战术将刘铭传围困在层层包裹之中,僧格林沁的命运等待着刘铭传,这个长期以来是太平军、捻军劲敌的悍将失掉了活命的信心,他不仅“衣冠失落”,而且“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等死”。其部将唐殿魁等均被打死,李鸿章的唯一王牌军陷入了绝境。

当东捻军集中全力消灭刘铭传军的时候,湘系的鲍超知道淮军已陷入绝境。为了发泄湘系的积愤,也为了独占战果,只有在刘铭传大败之后,鲍超才以全部精力,猛攻东捻军之背,东捻军似乎没有料到这一手,因而大胜变成大败,不得不撤军急退,鲍超又猛烈追击,东捻军继续失败。这一役,东捻军损失人员在二万以上,马匹、军械也损失极大。刘铭传在绝处逢生,淮系李鸿章极端沮丧,湘系集团却志得意满了。

尹隆河战役虽然使东捻军遭到大败,但这一战役却起了两大作用:第一,由于清军云集臼口附近,使东捻军得以冲出包围圈,使清军的臼口之围的战略宣告破产。三月二十三日(二月十八日),东捻军在蕲水六神港打死鄂军记名藩司彭毓橘,将新湘勇全部解决之后,便结束了反围攻斗争的任务,而于五月下旬突围北上河南,完成其胜利和发展的抗清斗争第一阶段。第二,尹隆河战役使湘、淮两系矛盾尖锐化。刘铭传报失败为胜利,攻讦鲍超作战误期,李鸿章偏袒刘铭传而攻讦湘系;清王朝也责骂鲍超有意不支援刘铭传;连湘系

内部的曾家兄弟也不满意鲍超惹下淮系。曾国藩为和缓湘、淮矛盾计,遂将鲍超所部“霆军”全部裁撤。湘系仅有的精锐也裁撤了,从此,淮军益加发展,湘军裁撤殆尽;淮系气势大增,湘系更趋衰落。

但是,尹隆河战役也带给东捻军以巨大的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除了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主要是东捻军经此一败,遂认为无法击败鲍超,而放弃了进入川、陕的正确战略计划,误入山东运河以东地区,因而终于遭到覆灭。在游民成分基础上产生的捻军流寇主义,使其缺乏坚持完成战略计划的意志和决心,常常把军事行动放在无计划、无远见的盲目流窜上,这是东捻军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其实,以当时战争形势而论,东捻军进入川、陕,击败鲍超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除了前面我们业已叙述过的西北地区革命正在高潮等有利条件外,即以鲍超的清军而论,将其击败也是可能的,因为鲍超清军有三大弱点:(一)战线长。以鲍超仅有之兵力,要扼守北达潼关、荆紫关,南达汉水的千里防线是绝对不可能的,兵力是不敷分配的。(二)矛盾大。“霆军”不仅抢掠最凶,而且与所有清军派系几乎都有裂痕,“霆军”若受打击,其他各部清军会坐观其败北。曾国藩以后之所以忍痛裁撤它,其理由正在此。(三)“降众”多。“霆军”中有大量原太平军及各地零星起义军投降人员(据说占一半),其中多是战败之后无奈而降,有如宋景诗之曾经“投降”胜保一样,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反正过来。“霆军”因闹缺饷而经常哗变,哗变之次数、人数最多,曾国藩为此经常担心。捻军若能派人秘密联络,所谓“降众”是会起而响应的。

由此可见,击败鲍超是可能的,进入川、陕也是可能的,东捻军能够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

三、东捻军抗清斗争的失败和覆灭

1867年的五六月之间,东捻军在湖北击败清军围攻以后,便扔